

◆本刊特稿

为中国气派语文教育学奠基

——于漪语文教育思想文化价值研究

◎李华平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语文教育大家,于漪是“那一代”的代表。于漪先生认为语言具有十足的本体性,语言是语文课程的核心,语文学具有超越课程的价值,她站在教师责任与使命的高度重视语文课程的教育性。她对中华民族文化基因自觉体会、高度认同,其语文教育思想渗透着中华民族传统辩证思想,她的语言表达通俗易懂,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于漪语文教育思想为构建具有中国气派的语文教育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 :语言 文化 中国气派 语文教育学

建构中国气派的语文教育学,必须认真研究具有本土特色的我国古代语文教育思想,必须研究1904年语文独立设科110多年来一代代优秀语文人尤其是前辈大家的语文教育思想。笔者于2014年提出“语文教学要走正道”的主张,提出“重读叶圣陶,学习‘那一代’”的倡议。这一主张和倡议得到众多专家、学者、一线教师的响应,对新世纪初一些走偏的语文教学现象进行了拨乱反正的努力。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语文教育大家,于漪是“那一代”的代表,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于漪语文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对建构中国气派的语文教育学具有奠基性价值,构筑了语文教育哲学的基石。

一、于漪语文教育思想的哲学意蕴

要用三言两语概括于漪语文教育思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甚至可能是一件错误的事。为了便于从语文教育思想长河中比较清晰地予以辨认,我们可以从语言、语文、生命三个层面作一些初步探讨。

(一)语言的本体性

在于漪先生语文教育思想体系中,“语言”具有十足的本体性。从哲学层面来说,本体是指事物的本源、根本。于漪先生认为,语言既是确认人存在的本体,也是作为学校课程之一的语文课程的本体。

1.从语言与人自身的关系来看。

关于语言与人自身的关系,东西方传统哲学都有一个共同之处,认为语言是人的工具,可以脱离人而存在。但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1],而且一旦产生,语言

就成为人类社会中的真实存在,而且这种在社会中存在的语言本身就是作为属人的人化自然的一部分,成为人文社会环境中不可或缺的一种自我与他者相互依存的文化生存空间,就像人类离不开阳光、空气和水一样,语言获得了一种实践生存论意义上的哲学意蕴。简单地说,语言就是人本身——语言是人确认存在的重要组成部分。

遗憾的是,由于多种原因,马克思主义关于语言就是人本身的思想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直到一百年后的20世纪中叶,西方哲学发生了一件大事——“语言学转向”,从而将西方现代哲学与传统哲学进行了区别与转换。由此,“集中关注语言”成为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语言不再是传统哲学讨论中涉及的一个工具性问题,而是成为哲学反思自身传统的一个起点和基础。“语言学转向”从哲学层面确认,“人不能直接地认识和掌握对象,人通过语言符号系统同对象打交道。语言和世界、对象是不能分割开来的”^[2]。恰如著名学者朱光潜先生在经过充分学理论证后所说的:“思想与使用语言是同时发生的同一件事情。”^[3]

于漪先生正是基于对语言之于人本身的本体价值的深刻体认,来理解语文课程的价值、性质与内容、方法的。她说:“语言就像空气一样在我们周围,它形成了人的气质、品格、感知的方式、思维的方式。”^[4]^[31]她还进一步指出:“语言与思想、情感同时发生,语言不仅仅翻译思想,不仅仅是载体,而且是意识、思维、心灵、人格的组成部分。”^[4]^[22]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中国人如果不能流利地说中国话,也就很难确认其“中国”

属性；一个中国人如果说一套做一套，也很难确认其纯正的“中国”属性——语言没有成为他本身的一个部分，而是虚空、分离的，正所谓“魂不附体”。

2. 从语言与语文课程的关系来看。

(1) 语言是语文课程的核心。

随着中国学生核心素养体系的公布，高中各学科课程标准修订稿的颁布，核心素养成为研究



热点。在课程标准中，语文核心素养有四个要素，分别是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不少语文教师对这四个核心要素之间的关系不甚明了，遂感叹：“都是核心，其实就没有核心了！”

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站在语文课程哲学的高度才能抓住中心。语文课程是干什么的？说白了，就是中华民族母语教育（不同于某一个特定民族的母语教育），用语文课程标准的话来说就是教学生“学习祖国语言文字运用”。核心素养的四个要素中，语言是核心之核心，思维是语言文字运用的思维，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思维；文化是语言文字运用的文化，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审美是语言文字运用的审美，不同于音乐、美术、舞蹈的审美。

针对有些语文课“搞不清楚是语文课、政治课，还是电视课、杂耍课”的现象，于漪先生斩钉截铁地指出：“语文课就是语言文字的课，你是教语言文字和语言文字的内涵，它的思想内涵、文化内涵”^{[4]33}，“我们的语文千万要让它姓语言文字，恢复它的本性，而不是去搞花里胡哨的东西”^{[4]35}。她对为了所谓“人文”而“把语言文字抽掉空谈”的做法极为不满：“人文是一种思想、一种理念，绝不是教学环节，教学步骤，它不是‘胡椒粉’。”她反问道：“语文课离开了语言文字的含英咀华、篇章结构的探讨，教什么？”^{[4]33}她提醒语文教师：“脱离文本，脱离语言文字，花里胡哨，就走了样，就背离了课程标准的基本精神。”^{[5]282}一定要妥善处理语言文字与德育、美育的关系，“语文课就是以语言文字的要求为核心，融合德育和美育，而不是去外加什么东西”^{[4]367}，语文教学“要目标清晰，重点突出，教在关键处，点在要害上，学生真正理解与体会语言文字表达情意的奥妙，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提高语文能力”^{[4]350}。

(2) 语文学具有超越课程的价值。

如前所述，语言是人确认存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就是这个民族确认存在的重要

组成部分。于漪先生对此有深刻的认识：“语言的背后是一种文化的深层编码，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4]1}，“语言文字对外是屏障，对内是黏合剂，它蕴涵着民族的思维方式”^{[4]2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具有超越课程的价值。因此，语言的意义和价值不是某一门课程所能完全承载的，各门课程都承担着学习祖国语言文字、传承中华文明的重任。

作为以“学习语言文字运用”为专责的语文课，也就天然地具有超越学科、课程的价值。语文不同于一般课程，语文是其他课程的基础，没有较强的语文能力，其他课程的学习也会打折扣，行而不远；在学习、传承民族文化方面，语文学具有其他课程所不具有的优势，学生学习《岳阳楼记》就受到了胸怀天下的熏陶。于漪先生指出，“母语是民族文化之根，重不重视、学不学得好是一个文化认同的问题，绝对不是简单的一个学科、一门课程的问题”^{[4]23}，“热爱语文，在习得语文能力的同时，孜孜不倦地把蕴藏的文化基因植入自己的血脉，促进灵魂发育，精神成长”^{[4]2}。她还从中国人学汉语和外国人学汉语的区别来帮助我们认识语文教育的独特意义：“外国人学汉语是要和中国做生意，赚中国人的钱，当然也有极少数的人搞研究。中国人学母语是传承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形成中华民族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这两者是不能等同的。”^{[4]30}

(二) 语文的教育性

任何学科的教学都具有教育性，任何放弃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教学，都是不合格的。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方面，语文课程具有独特的优势，也就应该承担更重要的责任。对此，于漪先生论述道：“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地质层，积淀了中华文化的精粹。教学生学习语文，也就是用人类的精神文明，用中华文化的乳汁哺育他们成长，提高他们对自然、社会、人生的认识。”^{[4]22}这对于那些把语文课程当成纯粹工具课，自动放弃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渗透人文精神的做法是一种十分必要的提醒。正因为如此，语文课程

标准指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审美情趣,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不能把它们当作外在的附加任务”。于漪先生主张:“无论是传授字、词、句、篇的知识,还是培养听、说、读、写的能力,都应注意渗透正确的思想观点,熏陶感染以高尚的道德情操。”^{[6]29}

对语文课程教育性的认识又必须与语文教师的使命与责任联系在一起。教师不同于一般的职业,其工作对象是活生生的人——祖国未来的接班人和建设者,用于漪先生的话说,教师是“一个肩膀挑着学生的现在,一个肩膀挑着国家的未来”,要“站在时代的高度,战略的高度,育人的高度”研究教学。这就决定了教师的工作不能只是“稻粱谋”,而应具有蕴含伟大情怀的使命感。没有使命感的语文教师,所教出的学生也常常得“软骨病”。于漪先生指出:

教师的视野不能只局限在“文”,教文须服从育人的大目标,为这个大目标服务;也只有心中有活泼泼的一代新人的生动形象,想得远些,想得深些,才能站在高处认识培养和提高学生语文能力的重要意义,才会在培养学生掌握与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过程中渗透时代的精神,才不至于把语文教学的这样那样的活动只单纯作技术上的处理。^{[6]34}

(三)生命的真诚性

语文教师在课堂上教学生做真人,在生活中、工作中、学术讨论中是否能够做到,在这方面,我们也要向于漪先生学习,知行合一,言行合一。

于漪先生著述颇丰,但她的教育思想不是简单地用文章、专著累积起来的,更值得关注的是她的“不是讲讲算数,而是要真正做到”的真诚性(或诚意性),“加强思想修养,检点自己的一言一行。努力做一个至诚光明磊落的人,待人以心见心,处事开诚布公”^{[5]475}。

较之一般知识分子,语文教师更需要加强自身修养,让课堂上那个胸怀天下的自己,能够不为了一己私利而蝇营狗苟;让学生在面前那个畅讲“人文”的自己,在生活中、在学术交流中能够真真切切地尊重人——尤其尊重与自己不同意见的人。于漪先生指出:“论道也要论品,无品就会信口雌黄……尊重别人,平等地讨论,才能真正提高‘论’的内涵,‘论’的质量,使大家心悦诚服,深受其益。”^{[5]20}

于漪先生的语文课没有做作的成分,于漪先生的为人也真诚到没有一丝杂质。她不是“讲讲算数,而是要真正做到”^{[5]473},体现了对语文教师生命真诚性的彻底追求:“做人须人前人后、里里外外一样,‘表里俱澄澈’,来不得半点虚伪。”^{[5]473}她说自己“一辈子都在学做教师,就是在不断地完善自己的人格,不断地提升

自己的精神世界,不断地进化自己的感情”。她告诫我们:“要教学生做人,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要努力成为一个大写的人。”“文革”中,造反派逼迫她揭发校长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她觉得校长起早摸黑,对青年教师严格要求、着力培养,也从没听说所谓“被捕叛变”之事,所以拒不开口,因此遭受毒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正直、勇敢的精神啊!2014年10月,于漪先生给笔者打来一个电话。当时,笔者因为刚刚结石手术不久伤口未好,电话中说话声音较小、气息较弱。她听出笔者与以往的不同,便关切地询问。笔者不想让她担心,便谎称感冒了。过了几天,她竟专门打电话来询问笔者感冒是否好了。笔者感动得热泪盈眶。一个年近九旬的前辈大家,竟牵挂着一个后生晚辈的“感冒”,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胸怀和精神?于漪先生用无数行动告诉我们,无论教学还是做学问,最重要的根基是做人。“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身正才能道正,“只有教语文的人对了,才能谈教对的语文,这是正道语文的基座”^[7]——人格的魅力才能真正铸就具有持久魅力的课堂、永放光芒的思想。

二、于漪语文教育思想的中国气派

于漪语文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体现了蓬勃的民族精神,为构建具有中国气派的语文教育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思想渊源 醇厚独特的民族基因

于漪先生语文教育思想植根于中华民族丰厚的精神沃土中,继承了世代中国文人、知识分子高远的精神追求,符合中国文化精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审美观,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情感、趣味和习惯,流淌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血液。

在于漪先生的著述中,常常流露出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由衷热爱。如: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语言之精练,从社会到家庭细胞每个层次用这么精练的语言加以表达,这就是人文,这就是文化的结晶,是我们祖祖辈辈认识社会的智慧的结晶。^{[4]34}

这种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就体现了于漪先生对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自觉体会与高度认同。这是中国气派语文教育思想的文化基因,这种基因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文化动力,是中华民族面对外族入侵奋起抵抗直至胜利的精神动力。语文教育首先就要指导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体会认同中华文化。针对某些教育研究中玩洋概念的现象,于漪先生指出:“学习外国十分重要,但要放出眼光,区别正误、优劣,用心挑选,……那种看到一鳞半爪,就寻章摘句,奉为神圣,照抄照搬,一脚踢翻优秀传统,除了搅浑教学思想、教学行为,实在无可取之处。”^{[4]48}

于漪先生阐述语文教育思想的文字既娓娓道来,又吐纳风云,读来使人荡气回肠,能够感染人、鼓舞人、激励人、塑造人。这不仅是因为于漪先生语文功底深厚,更在于其精神崇高,诚如清代沈德潜《说诗碎语》所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于漪先生胸襟博大,志存高远,把语文课程建设和祖国民族命运相融合,将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相联系。她的文章所展现的精神世界浩瀚豁达,所抒发的主观情感热烈奔放,所承载的思想内涵博大精深,令人震撼,给人力量。

(二) 指导思想 辩证守中的民族传统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辩证思想传统的民族。《老子》中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体现了事物间的相依相随性。《易经》更是中国古代体现辩证思想的经典,它说明万事万物都是“易”(变化)的。恰如《诗经》所说:“高岸为谷,深谷为陵。”高的堤岸可以变为深谷,深谷也可以变成丘陵。古代寓言故事《塞翁失马》则形象具体地说明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事物间相依相随、相互转化的辩证思想。而“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则体现了中国古人饱含辩证思想的人生智慧。

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语文教育一直受各种因素影响,总是在工具性和人文性(思想性)之间摇摆不定,缺少定力,其实质是缺少辩证思想和守中意识。这种钟摆现象,给语文教育带来了极大伤害。

于漪先生语文教育思想则渗透着中华民族传统的辩证思想,对于语文教学中的一系列关系的处理,她这样论述道:

在教学实践中,如何处理教文与教人的关系,教材与教法的关系,知识与能力的关系,能力与智力的关系,听、说、读、写之间的关系,讲与练的关系,课内与课外的关系,教与学的关系,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等,如果不坚持辩证法的观点,往往就会挂一漏万,顾此失彼,往往就会单打一,就局部论局部,缺乏整体观念。如果不坚持辩证法,在进行实践或开展研究时,就可能钻牛角尖,搞得很片面,弄得不好,把第二位的东​​西弄成第一位的,流连忘返,影响教学的健康发展。^[8]

不讲辩证法,就会“钻牛角尖”而不自知,甚至还“流连忘返”,自以为找到了“新大陆”。有教师教《愚公移山》,得出“愚公是一个阴险狡猾的阴谋家”的结论。有教师教《窦娥冤》,从窦娥发愿“亢旱三年”得出窦娥是一个“报复社会的危险分子”的结论。有教师教《孔乙己》,由茴香豆得出孔乙己“回乡”的美好愿望。这些谬误,都是源于“缺乏整体观念”的偏执思想。

于漪先生语文教育思想体系中的辩证思想,既体现在宏观上,又体现在微观上。从宏观上,她对语文课程中的思想教育与工具性进行了深透的论述:

就语文教育而言,过去也走过一些弯路,强调思想教育时,往往把语文课上成思想政治课,强调工具性,强调知识,又重术轻人,忽视了人的道德、情操、人格的培养。为此,我孜孜矻矻,上下求索,左右对照,不断敲打自己,不断反思、改进,力求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不追风,不沽名钓誉,不乱提口号,不拾别人牙慧,壮自己的声势,坚持教书育人的方向,在培养与提高学生理解与使用祖国语言文字能力的过程中,撒播做人的良种,熏陶感染,春风化雨。^{[5]482}

在微观上,对文本解读中“弄懂语言文字”与“理解文章的思想内容”的关系,她明确指出“只有把文道两者辩证地统一起来进行教学,缘文释道,因道解文,才能使学生在弄懂语言文字的基础上,深刻地理解文章的思想内容,受到启发与感染”^{[5]79},从而“让语文课既有扎实的语文功力,又有闪光的育人风采”^{[5]280}。

(三) 语言表达 通俗易懂的民族风格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劝说敌军,都十分注重语言表达的通俗易懂。尽管留存于世的大多为文言文,但摆事实、讲道理都力求让对方容易明白,体现了中国古人为对方着想、注重交际效果的民族思想。于漪先生的文章,也都体现了这一特点,深入浅出,明白晓畅,雅俗共赏。尤其是读到有些学者“概念满天飞”的论文时,更会深刻体会到阅读于漪先生著述“中国人说中国话”的亲切美好的感觉。

1. 用语浅显,含义深刻。于漪先生著述颇多,思想深刻。但她并不玩弄概念、炫耀深刻。她用语浅显易懂,却又含义深刻,耐人寻味。思之得一层,再思又得一层。如,“其实语文就是语文,自己一定要有主心骨,不要今天东风,明天西风,东南西北随风倒,搞得自己晕头转向”。她用“主心骨”喻指对语文课程的正确理解,用“东风”“西风”喻指各种流行的说法,浅显易懂。这样的语言在她的著述中俯拾即是。这一点,与叶圣陶先生相同。叶老的文字十分简洁、明畅、平实、自然,没有一点晦涩之感。

2. 善讲故事,有画面感。读于漪先生的著述一点也不觉得累,其中有个重要因素就是她很善于讲教育教学中的故事,让我们在读故事的过程中,不知不觉接受她的观点。她讲故事,不是平铺直叙,而是抓住典型细节,几笔勾勒,颇有画面感。她曾经讲到一个男孩子开始不喜欢学习语文,后来在老师帮助下喜欢上语文课的状态:“上课时听到兴处,他的身体会微微向前,手不自觉地推眼镜框,有时嘴还紧紧咬住笔杆。”^{[5]91}

3. 巧用修辞,生动活泼。于漪先生的文章读来亲

切自然,还在于她善于使用各种修辞手段,搭配句式、使用辞格,使语言富于变化、意蕴丰富、形象生动,不少句子还音韵协调。如在论述教师对学生的理解时,她这样写道:“了解学生,是为了和他们的心弦对准音调,理解他们,研究他们的发展变化,促使他们健康成长。”^{[5]86}她用“对准音调”形象生动地说明了教师走进学生心里的重要性。在论述课内、课外关系时,她指出:“课文学习是‘一掬水’,课外学习是‘江河湖海’,把学生关在教室里而忽略生活实践,这无疑是‘小学而大遗’。”^{[5]8}十分恰切、形象,让人久久不忘。在阐述“学生具有独特性、多样性”时,她这样论述道:

性格有开放的,有内向的,有喜欢发表意见,一吐为快的,有口拙,羞于言谈的,学习有努力的,细致的,有马虎的,粗疏的;有喜欢热闹的,朋友多的,有喜欢安静的,一二知己的,甚至孑然一人的……^{[5]85}

在这里,她用短句把学生性格的多样性表现得十分充分,而且形象可感,让人印象深刻。

三、于漪语文教育思想的奠基性价值

以于漪、钱梦龙、宁鸿彬、欧阳代娜、魏书生等为代表的“那一代”语文教育家,以大无畏的勇气,以踏实刻苦的努力,为中国语文教育积累了难以复制的经验。作为后学,我们必须虚心学习,认真领会,绝不能历史虚无主义地认为自己的东西是“天外来客”,动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于漪语文教育思想是我国语文教育思想宝库中的璀璨明珠,为构建中国气派语文教育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指明了语文建设的根本方向

从语文教育哲学的角度来看,于漪先生语文教育思想为语文课程建设确立了根本方向:

1.从课程任务来说。语言是语文课程的核心,语文课程要紧紧抓住“学习祖国语言文字运用”的缰绳。

2.从核心价值来说。语言、语具有超越学校课程的价值,要站在传承民族文化、鼓舞民族精神的高度教学生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

3.从教师要求来说。语文教师要站在时代的高度、战略的高度、育人的高度研究教学,同时加强自身修养,努力做到言行统一、知行合一。

这些都为构建中国气派语文教育学奠定了最核心的基石,具有指南针式的意义。

(二)体现了语文学人的崇高追求

于漪先生为语文教师树立了终身学习的榜样,“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她的一节节精彩的语文课,一篇篇精彩的文章,一个个精彩的故事,为语文教育研究提供了典型案例。从她身上可以学习的东西很多,从中国气派语文教育学构建的角度看,她

的崇高追求更是体现了一代语文大家的文化自觉、学术自觉。2013年,她在“上海市中青年语文教师论坛”上发表题为“语文教育要致力于拥有自己的话语权”的讲话:

我们中国教育一定要有自己的话语权,我们不能一举例就只有孔子,永远只有一个孔子,其他就没有了。过去,我们一边倒向苏联,开口闭口“凯洛夫”,现在则是倒向“欧美”。中国那么多的教师,一千几百万的教师,那么丰富的经验,但在教育领域,我们没有话语权。我梦寐以求的是中国有自己的教育学。^{[4]184}

我们当前正需要于漪先生这样的文化自觉,自觉担当起历史重担,构建具有中国气派的语文教育学。在此过程中,要善于处理继承与发展、自立与引进、坚守与创新的关系,努力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习近平语)。尤其要保持定力,把握住前进的“方向盘”。

这份定力来自对中国语文教育历史经验的吸纳、继承与坚守。大学问家梁漱溟先生认为,“相似相续,非断非常”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今天与昨天不同,但今天有昨天的“成分”在;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是“永恒”的,总是变化着,但又并非截然不同完全断开的。我们对语文教育规律的认识也是这样,要善于从纷纭复杂的现象中理清思路,找准相似点、接续点,发现引入点、创新点。

我们需要站在以于漪、钱梦龙、宁鸿彬等为代表的前辈大家的肩膀上瞭望远方。读大家,学大家,研究和践行大家的语文教育思想,抵抗语文教育的“历史虚无主义”,为构建中国气派语文教育学做出我们这一代人的贡献。^⑫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教育部规划课题“正道语文:百年语文教育规律的探索与坚守”(课题批准号:FHB170592)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4.

[2]强乃社.论当代社会哲学的语言学转向[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48.

[3]朱光潜.思想就是使用语言[J].哲学研究,1989(1):27.

[4]于漪.语文的尊严[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4.

[5]于漪.岁月如歌[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

[6]于漪.我和语文教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7]李华平.正道语文述与解[J].语文教学通讯,2015(12B):11.

[8]于漪.我和语文教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20.